

谢娅婷 靳小怡 ◎ 著

群际关系

对中国农民工 公共安全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与婚姻的视角

Qunji Guanxi
Dui zhongguo Nongmingong
Gonggong Anquangan De Yingxiang Yanjiu

 中国农业出版社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群际关系对中国农民工 公共安全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与婚姻的视角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Relation on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Fear of Crim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and Marriage

谢娅婷 靳小怡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群际关系对中国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与婚姻的视角 / 谢娅婷，靳小怡著．—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 - 7 - 109 - 23472 - 7

I. ①群… II. ①谢… ②靳… III. ①民工-公共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1468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边 疆 赵 刚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7.875

字数：201 千字

定价：38.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FOREWORD | 前言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转型的加速发展时期，社会整体的平稳运行、有序变迁与稳定发展是居民的共同愿望，而公共安全感则是对这种愿望满足程度的反映。因此，公众的公共安全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更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群际关系的和谐程度势必会影响农民工的公共安全感。系统研究群际关系对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影响，有利于掌握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为改善农民工的公共安全感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

本书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教授团队与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杜海峰教授团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李树茁教授团队持续关注中国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包括关注性别失衡下的婚姻、家庭、养老、健康、公共安全、社区治

理等重要问题。杜海峰教授团队自 2004 年以来致力于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民工问题，以农民工问题为背景，将以多学科交叉为特征的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引入公共管理和社会科学领域，在社会系统复杂性、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复杂系统建模等研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李树茁教授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杜海峰教授给予了大力帮助，刘利鸽、李成华、刘茜、白萌、牛静坤、何晓晨、顾东东、任峰、任义科等均给予了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河南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河南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农业政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农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的联合资助。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著 者

2017 年 10 月

CONTENTS |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1.1 现实背景	1
1.1.2 理论背景	4
1.1.3 研究意义	8
1.2 概念界定	10
1.2.1 农民工	10
1.2.2 公共安全感	11
1.2.3 群际关系	13
1.3 研究目标	14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14
1.4.1 理论研究	16
1.4.2 实证研究	16
1.4.3 政策建议	16
1.5 研究数据与方法	17
1.5.1 数据来源	17
1.5.2 研究方法	18

1.6	章节安排	20
1.7	主要创新点	21
2	文献综述	24
2.1	公共安全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24
2.1.1	公共安全感研究的相关理论	24
2.1.2	公共安全感的实证研究	32
2.1.3	研究述评	35
2.2	群际关系与公共安全感研究	36
2.2.1	群际关系理论	36
2.2.2	群际关系对公共安全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38
2.2.3	研究述评	41
2.3	农民工群体公共安全感的相关研究	42
2.3.1	农民工群体的公共安全感问题	42
2.3.2	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群际关系问题	45
2.3.3	研究述评	48
2.4	性别及婚姻视角下的公共安全感研究	49
2.4.1	性别视角下的公共安全感研究	49
2.4.2	婚姻视角下的公共安全感研究	52
2.4.3	研究述评	53
3	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分析框架	54
3.1	一般迁移人群公共安全感概念模型及 适用性分析	55

3.1.1	一般迁移人群的公共安全感概念模型·····	55
3.1.2	西方一般迁移人群公共安全感的 适用性分析·····	64
3.1.3	西方一般迁移人群公共安全感模型的 局限性分析·····	67
3.2	群际关系对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影响的概念模型·····	72
3.2.1	农民工公共安全的现实情境分析·····	72
3.2.2	群际关系对公共安全感影响的概念模型·····	80
3.3	验证策略与研究方法·····	91
3.3.1	验证思路与验证关键点·····	91
3.3.2	数据·····	94
3.3.3	研究方法·····	98
3.4	小结·····	102
4	群际关系对公共安全感的影响：农民工与 市民的对比·····	104
4.1	研究设计·····	104
4.1.1	研究目标与分析框架·····	104
4.1.2	研究方法·····	106
4.1.3	变量测量·····	107
4.2	农民工与市民的现状分析·····	111
4.3	群际关系对居民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115
4.3.1	体制身份·····	116
4.3.2	群际关系效应·····	117

4.3.3 被害经历效应	117
4.3.4 脆弱性因素效应	118
4.4 市民与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对比分析	118
4.4.1 市民群体公共安全感分析	118
4.4.2 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分析	120
4.5 小结与讨论	122
5 群际关系对已婚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125
5.1 研究设计	125
5.1.1 研究目标与分析框架	125
5.1.2 研究方法	128
5.1.3 变量测量	129
5.2 已婚农民工群际关系与公共安全感的现状及性别差异	137
5.3 群际关系对已婚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138
5.3.1 群际关系效应	138
5.3.2 社区融合效应	139
5.3.3 邻居类型效应	139
5.3.4 被害经历效应	139
5.3.5 脆弱性因素效应	140
5.3.6 流动因素效应	140
5.4 群际关系对已婚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影响的性别差异	142

5.4.1 已婚男性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分析	143
5.4.2 已婚女性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分析	146
5.5 小结与讨论	149
6 群际关系对未婚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影响及 性别差异	152
6.1 研究设计	152
6.1.1 研究目标与分析框架	152
6.1.2 研究方法	153
6.1.3 变量测量	154
6.2 未婚农民工群际关系与公共安全感的现状及 性别差异	160
6.3 群际关系对未婚农民工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161
6.3.1 群际关系效应	161
6.3.2 社区融合效应	162
6.3.3 邻居类型效应	163
6.3.4 被害经历效应	163
6.3.5 脆弱性效应	163
6.4 群际关系对未婚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影响的 性别差异	165
6.4.1 未婚男性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分析	166
6.4.2 未婚女性农民工公共安全感分析	168
6.5 小结与讨论	171

7 结论与展望	174
7.1 主要结论	174
7.2 政策建议	178
7.3 研究展望	184
参考文献	186
附录 A 厦门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问卷	205
附录 B 西安市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问卷	223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小心点，注意安全”，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正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道出了普遍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对于公共安全感的需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被看作心理健康的同义词^[1]。公共安全感正是安全感中重要的一部分^[2]。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国家犯罪率急剧增长，对社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侵害，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影响。“犯罪行为除了会造成被害者的实际损失之外，同时也会引发包括被害人和其他潜在被害人心理上的恐惧，降低人们的公共安全感”^[3]。对于个体而言，公共安全感的缺失会促使个体产生孤立感和脆弱感，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从而降低个体的心理福利和心理健康。对于社区而言，那些生活在不安中的人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而不是外出，这将减少对邻里和社区的监测水平，导致社区犯罪率的增加^[4]。不安具有累计效应，当大量人群由于恐惧和不安而减少社会联系和交往，社区凝聚力和正式控制力将会降低^[5]，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潜在机会，对社区生活质量构成了潜在威胁。

较低的公共安全感可能引发连带的负面社会效应,使公共安全感问题和犯罪行为一道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西方国家在关注犯罪及犯罪人的同时,开始考虑公共安全感缺失对社会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伤害,据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及政策干预。

我国曾经被称为一个“无犯罪”的理想社会,很多地方都是“夜不闭户”^[6]。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犯罪率也在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峻,缺乏安全感似乎是这个时代人人都会有的感受。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8年全国每十万人中只有75.5个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而2001年该数据突破了300,2013年达到487.3^[7]。被偷、被抢等案件时常发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或被看到或被听到甚至亲身经历,这些都加重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使人们常常感到慌乱、焦虑和紧张。2006年零点调查公司针对常住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开始呈现连年下降趋势,2014年主流门户网站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不到一成人感觉“非常安全”。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要紧紧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平安建设”^[8]。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样指出:“老百姓有安全感,社会才有安定感,国家才能稳定发展”^[9]。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犯罪率的上升,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公共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应受到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自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务

工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独特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4亿,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劳动力。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10]。相对于工作、生活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农民工大多从事城里人所不愿意从事的“脏、累、险”工作,居住在工地、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等城市高犯罪率区域^[11],公共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同时,人口流动带来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加速了城市社会解体,特别是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城乡流动人口(农民工)的进入,使得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中进一步延续,形成了事实的城市二元结构,市民和农民工成为城市最主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时常受到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使农民工群体存在着高度疏离感,逐步成为了游离于城市并缺乏保护的社会群体^[12],导致了农民工群体严重的公共安全感问题。

进入城市后,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融合,是影响城市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12],关系着社会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但在城市中,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隔离,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实际交往较少,真正与农民工存在朋友关系的比例更低^[13],这正反映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客观的群际关系不容乐观。农民工经常遭受市民的歧视和城市社会“妖魔化”的贬损,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14]。这种被城市主流人群歧视和被排斥的现象让农民工群体的心理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被人看不起”让他们处处小心翼翼,对自己产生了更为脆弱的感知,

时常处于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因而农民工群体的公共安全感必然会受到影响。而市民群体对农民工普遍存在偏见与歧视性态度，不少市民认为农民工让社会治安变差、将农民工等同于“犯罪人”，这种对农民工群体的普遍偏见和歧视同样影响了市民群体的公共安全感。由此可见，农民工与市民之间较差的群际关系，势必会损害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公共安全感。

综上所述，公共安全感问题不能仅是政府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热议的话题，更应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尤其对于处于社会较为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脆弱性较强，抵御侵害的能力较弱，本身就存在着安全感的缺失，再加上城市中来自市民群体的排斥和歧视，安全供给严重不足，使他们的公共安全感问题更为严峻。因此，探讨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对公共安全感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1.1.2 理论背景

西方研究中，公共安全感常常表述为“Fear of crime”，即犯罪恐惧感。对“犯罪恐惧感”这一概念的理解，中国学者将之称为“被害恐惧感”“犯罪忧虑”“社会治安评价”以及“公共安全感”等，也有简称为“安全感”的^[15]，这反映出不同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在理解上的分歧。其中“被害恐惧感”或“犯罪忧虑”更多被视为学理上的概念；我国司法实务中直接使用这一术语的较少，而常以“社会治安评价”代之；而在中国的学术文献当中则更多使用“公共安全

感”或者“安全感”。

西方国家中,犯罪恐惧感一词最早出现在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15],宣言中提出免于犯罪恐惧和享受安全生活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随后许多国家展开了犯罪被害调查,为犯罪恐惧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西方学术界对犯罪恐惧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至今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并形成了得到广泛认同的一般性分析框架^[16]。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在一般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一些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也陆续展开,如对于移民群体、白人群体、黑人群体、老年人群体或女性群体的研究^[17,18],不同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修正,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其中,在对移民群体或不同族裔群体的研究中,群际关系与犯罪恐惧感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些都为我国公共安全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中国对于公共安全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主持进行的“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课题。随后国家统计局及一些非官方机构和网站陆续展开了有关群众安全感或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调查。由于官方和非官方调查着眼点不同,使用的调查方法并不统一,调查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难以进行对比分析。而对于调查结果通常只是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分析,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层次探讨,因而对公共安全感的研究难以深入。农民工群体通常直接被包含在一般群体的公共安全感调查和分析当中,但农民

工群体与城市其他居民本身具有明显的区别，将该群体的公共安全感与其他群体统一而论会使最终的调查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公共安全感水平，难以分析公共安全感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

尽管目前中国的公共安全感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和发展，但由于研究起步较晚，且缺乏对中国社会情境下特殊人群的深层次分析，因而尚存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第一，目前公共安全感研究整体以城市居民为主，对流动背景下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群体分化以及农民工这一特殊弱势群体关注不足。中国独特的城乡人口流动加速了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带来了城市群体的分化，农民工正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背景下所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属于城市的居民，但却在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较大差距^[19]，而这些方面正是影响个体公共安全感的重要因素^[20,21]，因而对农民工群体公共安全感问题的研究更应引起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关注。

第二，已有研究以城镇居民安全感的现状描述为主，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和基于理论的实证检验。目前国内对公共安全感的研究缺乏理论指导，因而无法形成系统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已有对于公共安全感的研究仍然集中于问卷调查及指标设计，由于调查口径和调查工具的不同，许多调查结果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并且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许多研究没有完善的分析模型，调查存在着对公共安全感特征及影响因素测量的缺失，不但很难反映公共安全感的客观现